

罗兰·罗伯逊与中国的全球本土化实践^[*]

王 宁

(上海交通大学 人文艺术研究院, 上海 200240)

[摘 要] 罗兰·罗伯逊是国际著名的全球化问题研究专家, 也是一位居于国际学术主流的知华友华学者。由于他的帮助和努力, 中国的全球化研究很快就进入了国际学术前沿, 并掌握了一定的话语权。此外, 他本人在理论上的主要贡献在于较早地从社会学和文化的角度切入考察研究全球化现象, 创造性地提出了“全球本土化”的理论建构, 对国际学界的全球化研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按照这一理论的内涵, 具有普世意义的全球化只有在特定的本土文化语境中才得以实现。可以说, 全球化在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证明了他的这一理论的有效性, 同时也为全球化之于中国的双重意义和价值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关键词] 罗兰·罗伯逊; 中国; 全球化; 全球本土化; 全球人文

DOI: 10.3969/j.issn.1002-1698.2024.04.008

全球化作为一个最先出现在西方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现象, 或者作为一种批评和理论话语, 在很大程度上是在一些著名的欧美思想家和学者的帮助下从西方舶来中国的。在与中国有着直接接触、对中国的全球化研究产生重要影响并在中文语境中广为引证和讨论的西方全球化思想家和学者中, 罗兰·罗伯逊(Roland Robertson, 1938—2022)无疑起到了十分独特的作用。他与其他西方全球化学者和思想家, 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阿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弗雷德里克·詹姆森(Fredric Jameson)和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等, 经常在中国的语境中被引用和讨论。他的专著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全球化: 社会理论与全球文化》)(1992)早在 21 世纪初就被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 并在翌年中国加入 WTO 之前成为一部具有拓荒意义和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王宁, 《学术界》本期封面人物, 文学博士, 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上海交通大学人文艺术研究院院长, 文科资深教授。曾任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教授, 2000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 2010 年当选为拉丁美洲科学院院士, 2011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2013 年当选为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2022 年被中国翻译协会授予“资深翻译家”荣誉称号。学术兼职包括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前会长, 中国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等。担任 7 种国际 SSCI 或 A&HCI 来源期刊编委或顾问, 连续数年入选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出版 20 多部中文专著, 500 余篇中文论文和 5 部英文专著, 在 40 多种国际权威刊物或文集发表英文论文 150 余篇, 收录 SSCI 或 A&HCI 数据库论文 110 余篇。2023 年, 入选斯坦福-爱思唯尔全球前 2% 顶尖科学家(文学研究)年度影响力榜单, 在全球 342 位入选者中名列第 57 名, 居前 1% 之列。

[*] 本文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艺术学重大项目“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艺术理论与实践研究”(23ZD03)的阶段性成果。

的重要学术专著。^[1]在当时的中国学界,人们只承认经济全球化,而文化上的全球化则没有得到中国大多数人文知识分子的认可,或者即使承认这一现象也认为只是西方文化影响中国,中国文化只能被动地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笔者和少数学者则从一开始就坚持认为,中国文化也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平台走向世界,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应该承认,罗伯逊建构的“全球本土化”(glocalization)的理论概念直接地影响了笔者和其他一些中国学者在中国语境下对全球化的研究和实践,这种自觉实践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日益凸显,我们的研究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今天我们纪念罗伯逊这位对全球化问题有着精深研究并且著述甚丰的理论家和学者就有着尤为重要的意义。

一、罗伯逊的中国之旅:一些个人的回忆

罗兰·罗伯逊与中国学者的关系是双重的:他不仅依靠中国学者在中国传播他的理论学说,同时他也帮助这些学者在国际论坛上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并在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他们的著述,这在他于2006年领衔主编的*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全球化百科全书》)中得到了特别的体现。^[2]这部百科全书被译成中文出版后,为中国政府官员、企业家和学者在全球化研究和实践中提供了重要的参考。^[3]此外,作为参与编辑这部百科全书的副主编之一,本人也从这个浩大的项目中受益匪浅。今天,在纪念罗伯逊、评估他对国际全球化研究的批评理论遗产时,笔者不禁回忆起与他相识并在他的指导下写下关于全球化问题的一系列著述和论文的那些难忘的插曲和时刻。

本人主要是一名人文学者,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名专事比较文学和世界文学研究的学者,主要从世界主义和世界文学的角度切入研究全球化问题。在笔者看来,全球化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上的现象,更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现象,它涵盖了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和科学技术的各个方面。因而笔者率先将全球化的概念引入中国的人文学术研究,并主持了首次在中国举行的“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取得了广泛的国内和国际影响。^[4]后来又在罗伯逊的支持下,继续从文化和人文学术的角度切入研究全球化问题,并率先在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相关论文。今天,当我们翻开中国著名的学术期刊《外国文学》2002年第1期,很容易就能看到这样一则新闻报道:

2001年11月26日,由清华大学外语系和比较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全球化和文化论坛在京召开。来自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等40多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论坛。主办方邀请了在国际全球化研究领域具有开拓性作用的著名社会学家和文化理论家罗兰·罗伯逊,就全球化概念及其与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关系作主题演讲。

本人作为论坛的组织者,向中国同事,特别是文学和文化研究领域的同事介绍了罗伯逊,并就全球化之于中国的人文学术意义作了主题演讲。尽管与罗伯逊来自不同的学科(他主要是一位社会学家,而笔者则主要是一位人文学者),但我们的两场演讲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了跨学科和跨文化意义的对话。

中国于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世贸组织并成为其第143个成员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罗伯逊于2001年11月访问中国正是恰逢其时。也就是说,从那时起,中国正式开始参与了全球化的机制和发展进程。那是罗伯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访问中国,虽不主要是应笔者的邀请,但事实上笔者却成了最大的受益者。从今天的角度来看,与罗伯逊相遇纯属偶然,但在这偶然的相遇中却有着某种必然的因素:我们都具有跨学科和跨文化的视野;都关注自己文化传统以外的学术进展。事情的缘由是2001年11月下旬,武汉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发起主办了一次全球化国际研讨会,罗伯逊和笔者分别作为西方和中国研究全球化问题的学者应邀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由于与会的中国学者大多刚刚开始接触全球化这一新的课题,也有相当一部分人通过阅读中译本才对这一新出现的理论问题略有

所知,而本人则已经成为为数不多的能够直接与罗伯逊进行深入讨论和对话的中国学者之一,自然对罗伯逊的来访感到由衷的高兴,并认为这是一个与他进行直接对话的难得机会。甚至在武汉会议期间,笔者就想充分利用罗伯逊的来访在北京也举办一个为期半天的高峰论坛,以便我们得以与这方面的国际权威学者直接交流,并与其进行深入的讨论和对话。这就是笔者与罗伯逊相识的机缘,同时也是我们得以一见如故的原因所在。

尽管罗伯逊是一位典型的西方学者,他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知之甚少,但他通过翻译阅读了一些关于中国的著作,并对全球化在中国的登陆及其对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巨大影响非常感兴趣。可在当时,全球化现象虽然吸引了许多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但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全球化问题论文的中国学者却凤毛麟角。在文化全球化研究方面,本人当时在国际英文期刊上发表了三篇关于文化全球化的文章,便忐忑地把这三篇并不算成熟的文章复印件送给罗伯逊,希望能得到国际全球化研究权威学者的批评和指导。罗伯逊利用在北京的短暂逗留时间读完了这三篇文章,并对其中的两篇非常感兴趣,其时,他应英国劳特里奇出版社邀请,正在编辑一部六卷本的全球化研究论文集。他希望笔者能授权将这两篇文章收录在编辑的文集中。笔者当然十分高兴,并立即授权他选录这两篇文章。^[5]

虽然罗伯逊的中国之行很快就结束了,但正如他在回国后写给笔者的信中所说,他此行最大的收获就是和笔者相识相交。他和华威大学的杨·阿特·肖尔特(Jan Aart Scholte)教授计划于2002年下半年在英国举办一次全球化问题的研讨会,并邀请本人以中国人文学者的身份出席。第二年,我们在英国再次会面,当时我们在会上讨论了是否有必要编辑一部《全球化百科全书》以及拟定其编写原则,出席者一致赞成这一建议,于是这一浩大的项目就在那次活动之后启动了。由于本人是唯一一位参加研讨会的人文学者,便被指派担任副主编,并加入了编委会,负责50个关于人文学科的条目。本人写了三个条目:“比较文学”“翻译”和“东方主义”,此外还负责评审所有其他关于人文学科的条目。

如前所述,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便开始对全球化产生了兴趣,甚至于1998年在北京组织了第一届“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但正是在与罗伯逊的会面和讨论之后,本人才很快地进入了国际全球化研究的前沿。故由衷感谢这位以著述影响和启迪我的域外老师,他影响和激励了包括笔者在内的其他中国学者,将全球化理论及其“全球本土化”的理论建构与考察中国的具体实践联系起来。在罗伯逊的“全球本土化”理念的启发和鼓励下,笔者在过去的十多年里,在国际论坛上发表了许多关于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和文学关系的著作和论文,^[6]并应邀在多个国际场合就全球化与中国文化作主旨发言。在下一节中,本人尝试着将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作为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模式进行考察,并从这一视角出发来分析中国式现代化的全球本土特点,因为笔者认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被全球化在中国的实践以及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模式的确立所印证。

二、“全球本土化”语境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众所周知,罗伯逊对全球化与文化最有影响的思想是所谓的“全球本土化”,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描述文化上的全球化。按照他的这一思想,全球化只有在特定的本土文化语境下才能得以实现,这一点在中国的成功实践中得到了印证,尽管中国的实践与罗伯逊的理论建构只是一种平行的关系,并非受到他概念的影响,但这二者的印证也说明了他的理论建构是能够被实践检验的,并且也可以为未来另一民族/国别的全球化实践所效法。在阐述“全球化”的概念时,罗伯逊这样写道:

事实上,全球化的概念传达了我近年来所写的关于全球化的大部分内容。从我的角度来看,

全球化的概念涉及传统上所称之为的全球和地方,或者更普遍地说,普遍和特定的同时性和相互渗透。严格地说,在当前关于全球化的辩论和讨论中,我自己的立场,我(和其他人)甚至认为有必要偶尔用“全球本土化”一词来代替颇有争议的“全球化”。^[7]

笔者不仅受到他关于“全球本土化”理论建构的启发,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的“全球本土化实践”的文章,而且他的理论也证明了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实践。^[8]在这一部分,笔者将尝试着运用罗伯逊的全球化/全球本土化理论来探讨和分析马克思主义是如何通过翻译和建构性解释驻足中国的,以及中国的文化和人文学术是如何走向世界的。在笔者看来,具有普遍性意义的全球化理论已经与中国的特定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实践相结合,并取得了预期的成果。同样,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在1949年取得胜利,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种“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摒弃了那种教条的马克思主义,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的特殊性。当前我们所从事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实践的自然发展和延伸。因此,罗伯逊的理论遗产应该得到正确评价和发扬光大,尤其是当新一波全球化浪潮出现时,这种全球化在中国实践的方向已经发生了变化:从中国走向世界,也即以中国的实践和中国道路的成功来为那些仍在建设现代化大业的民族和国家提供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此外,也以中国的实践经验为具有总体化特征的全球化理论作出贡献。

在大致描述了罗伯逊与笔者个人的学术交流关系及其对中国的全球化研究的影响之后,笔者将集中探讨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性/全球性实践的普遍意义。本人曾在其他场合对西方学术界关于现代性的主要理论及理论家的观点进行比较研究和讨论,此处不再赘言。^[9]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笔者主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及理论建构。在我看来,中国式现代化是全球现代性的一种“全球本土化”或“中国化”的版本。正如全球化的概念一样,现代性的概念确实也来自西方。但是,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中,始终存在一些现代性的成分。如果打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我们甚至可以很容易地分别在中国的儒家和道家哲学中看到近似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的元素:前者以积极参与社会现实为特征,后者以“以不变应万变”的超然态度处理现实;前者强调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后者则强调一种双赢的策略。应该说,中国文化传统中包含着这两个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影响的思想片断。因此,中国从古代发展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已经积累了诸多具有本土特色的现代性元素,其中一部分就是从西方发达国家引进的。在西方思想的激励下,中国现代性的进程便自然而然地开始了,其标志就是1915年至1923年间发生的新文化运动。受到西方现代性精神的启发,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者们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文化翻译运动。西方的各种理论和文化思潮通过翻译的中介蜂拥进入中国,加速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特别是为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新传统的形成铺平了道路。现在,我们可以结合中国发展的现状来反思和重构现代性和中国式现代化的理念。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性大计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的,那么它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模式,即全球本土化和本土全球化的双向发展模式,或者说中国化的现代性特征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模式。这种独特的发展模式,在文学和文化中具体体现在这样一条道路上:西方理论激活了中国的思想,推动了中国的创作和理论批评实践。在中国的实践中,它又逐渐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并经过理论家的抽象和建构,进入了国际理论界和思想界,对仍在建设现代化的那些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启发和影响。同时,它也解构了曾经的大一统“总体化”的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因此,现代性又是一种催化剂,它不断地鼓励理论家在中国的背景下,特别是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新时代探索新事物。在回顾西方现代性理论出现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如何界定中国的现代性?既然我们承认中国也有自己的现

代化计划和道路,那么我们就进一步追问:中国的现代性与全球的现代性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这对当前的中国式现代化意味着什么?笔者想重申,中国的现代性是全球现代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其独特性,它又不同于西方主导的全球现代性。因此,它也像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现代性。它的特点是包含了被激活的中国传统文化,并融入了一些西方的现代和后现代的因素。这些都已经开始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得到呈现。

现在,笔者将从文化的角度来探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内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认识到中国式现代化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的不同。具体而言,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它同时强调生产和经济的发展,以及技术、生态文明和文化的建设与发展。因此,这种现代化便是一种可持续的、并可以被其他国家所效仿的。

我们都知道,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战略和发展模式是以自然资源的耗竭作为代价的。当它们的现代化大计初步完成时,自然和生态环境已经遭到破坏,因此,它自然会受到各种以解构为己任的后现代思想观念的抵制和挑战。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兴起的文学生态批评和环境研究,就是对由来已久的人类中心主义的强有力挑战和解构,与西方国家现代性的成熟密切相关。世纪之交,中国的现代化大计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系列问题,特别是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生态批评一经被引入中国,就迅速地得到中国学者和文学评论家的回应。在这方面,中国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起到了带头作用,他们的作品和批评著述在为政府作出一系列环境保护和生态文明建设决策方面发挥了重要的参考作用。事实上,中国古代哲学家对生态问题的研究已经积累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因为儒家和道家都非常重视自然生态的平衡,尤其是儒家的中庸思想在解决发展过程中的极端方面起到了一定的平衡作用。然而,面对西方国家在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赶超和领先,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明显地感到落后和被边缘化。他们非常渴望通过大规模翻译西方学术和理论,从发达国家引进现代化建设的理论和经验。

尽管在中国古代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多是和谐的,但由于人类在过去几百年中不断地利用各种自然资源为自己服务,甚至达到了使自然资源枯竭的地步,其原因是他们没有善待自然,没有着力去保护有限的自然资源,这样大自然便对人类发起了无情的报复。因此,我们需要反思人与自然的对立和不平衡关系,并从自然生态的角度,扭转人类中心主义的专制和排他意识,使人们重新树立尊重自然、关爱我们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的观念。

致力于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我们所赖以生活的环境的变化尤其敏感。今天的自然写作研究者和生态批评家在讨论自然与生态的话题时,总是会提到美国作家梭罗的散文作品《瓦尔登湖》。事实上,作为一位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和现代环保主义的先驱,梭罗相信人类可以在大自然中快乐地生活,除了储备一些必需品外。他的乌托邦理想主义思想可能让今天的人们难以接受,但梭罗尊重甚至崇拜自然的精神至少对我们有一定的启迪。近年来,中国一些人文知识分子也效仿梭罗,远离城市的喧嚣,隐居荒野,平静地思考和写作。有些人甚至出于保护生命的动机而成为素食主义者。在笔者看来,这些都是建设生态文明的初步尝试。然而,无论他们的动机如何,在一个具有各种后工业和后现代特征的消费社会提倡梭罗的朴素和节俭,至少是对奢华喧嚣的城市生活的一种抵制。生态作家和批评家,虽然不像生态学家那样走极端,但他们致力于文学中的生态研究,至少可以在当代众多不同流派的文学批评中发出不同的声音。

此外,中国式现代化的许多基础理论学说都是从西方传入的,但西方的理论进入中国以后就和中国的本土实践相交融进而形成了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观念。在这些理论指导下所取得的成功经

验也可以为全世界人民,特别是那些正在抵抗帝国主义霸权的发展中国家所分享。因为我们都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就仿佛生活在一个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彼此分享福祉、共担责任。共同体的概念早就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那里得到阐述,它也应被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不可否认,“共同体”一词的内涵不仅在中国,而且在西方也一直是一个备受争议的话题。但就其基本含义而言,只有如下几点:首先,人们在共同条件下形成的集体或群体,如共同的经济或利益关系。其次,由几个国家根据各自的需要和共同利益组成的集体组织,如早期的欧洲共同体或当前的欧盟,这是一个政治共同体。再次,使用相同语言或具有相同宗教信仰的人们往往发现他们同处一个共同体中,彼此交流也很方便,这样的共同体往往被称为文化共同体,比如英联邦的松散组合和维系就是一例。最后,就爱情而言,它指的是最有凝聚力彼此相爱的人们所形成的群体。如此等等。我们今天所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际上主要指涉前三个含义。这是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根据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以及中国当下的具体实践,提出的一个具有普适意义的理论概念。

关于共同体概念的起源,人们也有不同的看法,但一般来说,它指的是具有共同或大致相似目标和利益的人自愿组成的群体。简而言之,这个词在英语中最早的含义是“公共群体”,直到中世纪才衍生出“公民”等词汇。后来演变而来的“公社”一词也有这个含义。当然,作为一个理论概念,最早的共同体概念是由法国启蒙哲学家卢梭提出的。后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共产党宣言》中将这些零散的思想发展起来,提升到共产主义社会的理想境界。因此,我们可以说,共同体的概念在现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其历史渊源和发展脉络。从共同体一词的角度来看,它与公社和共产主义有着相同的根源。在这方面,巴黎公社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实践。尽管巴黎公社失败后,革命处于暂时的低潮,但公社诗人欧仁·鲍狄埃(1816—1887)悲愤地写下了《国际歌》的歌词,而且很快便由比尔·狄盖特(1848—1932)谱成曲子。虽然公社的社员在世界各地流亡,但一曲熟悉的《国际歌》便将他们团结在一起,为一个共同的理想奋斗到明天,甚至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奋斗终身。这应该是当前中国人民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具有的历史和理论基础。因此,建立一个既代表全人类共同利益,又具有自身“全球化”特征的命运共同体是完全可能的和必要的。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达到的一个目标。

三、走向全球人文的理论建构

尽管中国在20多年前就已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从而进入了全球化的机制,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中国的“全球本土化”实践的成功,中国已经在短时间内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在海外的传播仍然相对滞后,并且不断地面临新的困难和障碍。事实上,中国的人文学者早就认识到全球化的重要性和必然性,并且积极地介入全球化进程,使得全球化成为近20年来中国语境中使用频率最高的理论术语之一。如果说全球化对中国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各个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那么这种影响不仅体现在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还体现于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增强。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地认识全球化的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全球化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也给人类生活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贫富等级差距的加大、自然资源的枯竭、国家/民族界限的模糊以及文化上的趋同等。

今天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就不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全球化也有不同的起源,它并不只是西方的专利。事实上,许多西方学者已经意识到,如果经济全球化始于西方发达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始于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那么文化全球化则走的是另一条道路:从中国古代的丝绸之路开始,这

至少是它的起源之一。因此“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具有很高的战略意图和站位,这实际上是一种中国版的全球化新理念。尽管全球化概念的引入标志着西方发达国家试图将其发展模式和价值观推向全世界,因此它一开始确实包含了一些帝国霸权的成分。就这个意义上说,全球化是最早出现在西方世界的一个现象。然而,全球化一旦得到推广,便给一些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带来了非常宝贵的机遇,并通过中国的“全球本土化”实践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此,美国前两届政府都高举“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大旗,企图对中国实施全面制裁。面对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既然美国威胁要退出一些国际组织,中国就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发挥应有的主导作用。因为无论是几千年的文明史,还是目前的政治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中国都完全有资格,而且有信心在新一波全球化浪潮中发挥领军作用。

正如笔者在前面所指出的,全球化在某个国家或地区的实现必然会与当地的民族文化发生碰撞和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全球本土化”的态势。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文化的全球化上,也即意味着文化全球化现象不仅仅是单一的“趋同”,还在于其多样性。此外,文化全球化并不是单向的,而是一个双向的过程:西方文化早已进入中国,中国文化也应该在海外传播,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异。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西方各种理论和文化观念进入中国后的变化中见出端倪。因此,我们可以说,全球化在中国的成功登陆,不仅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而且为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化铺平了道路。

面对这样一种态势,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应该怎么办?毫无疑问,在整个20世纪,我们都致力于引入各种外国文化观念和理论思潮,尤其是来自西方的文化观念和理论思潮。因此,我们中国的人文学者能够熟练地运用西方的理论概念和话语来解读中国现实。而随着全球化发展到今天,我们长期关注的一个焦点已发生了转移: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如何成功地实现海外传播。有人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的文化和人文学术自然会得到世界的认可。但事实又是怎样呢?中国的崛起反而更加引起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警惕,使得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加强了对中国的经济制裁。

我们都知道,经济上和科技上的硬实力是任何国家都必须关注并效仿的,而文化软实力则不一定如此,它包含着一个民族文化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特征。因此,单靠国外汉学家们来承担推广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任务,显然是不可能的。我们都知道汉学在国外,尤其在西方国家也是很边缘的,经常伴随着该国与中国的关系而进行不断的调整。此外,除了汉学本身的边缘地位外,汉语也是世界上最难学的语言之一。再加上中国文学和人文学科的深厚积淀,一位才华横溢的汉学家往往需要五年以上的时间才能掌握中文的阅读和交流,而达到中文出版的水平则需要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在这段时间里,他必须全心全意地从事专业学科的教学和学术研究,因而很可能远离该国和国际学术主流。

当然,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包括笔者在内的一些国内人文学者提出了在国际学术交流中发出中国声音的想法,甚至提出了构建中国自己的学术理论话语的设想。这自然是合法和必须的。事实上,中国被公认为全球化进程中的最大受益者之一,这主要体现在过去二十年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上。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它逐渐开始体现在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在世界各地的传播中。在过去的十年里,一些国内知名学者的著作在中华学术外译项目的资助下逐渐进入国际学术界,可以说,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确实已经“走出去”了,但是否真正走进国际学术界或国外的大学图书馆和图书市场,则有待时间的检验。在这方面,新一代人文学者将取得更大的成就。

作为一名人文学者,笔者相信互联网的普及甚至使我们与生活在世界各地的人们“实现了联通”。

可以说,今天我们就生活在这样一个幅员辽阔的“地球村”里。虽然它曾经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但经过各国人民的努力,现在这个“想象的共同体”已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了:在这里我们不仅分享利益,而且共担责任。

尽管我们仍不时地听到反全球化的噪音,但笔者仍坚信,全球化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任何人都无法阻挡。为了有效利用全球化这个平台,大力推动中国文化和人文学术的国际传播,笔者提出了一个“全球人文”的概念,并在一些场合作了表述。^[10]在这里再次深入阐述笔者的全球人文观。我们经常说科学无国界,实际上人文也没有国界,特别是文学艺术更是如此。一部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经过翻译或改编的中介,完全可以为全世界的文艺爱好者所共享。中外人文学术交流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一种“人文外交”,这完全可以在某个方面取得突破。因此再次重申笔者的“全球人文”观点并且作如下阐释。

首先,在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的今天,人文学科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在文学研究界,世界文学这一话题重获新生,并成为21世纪比较文学学者的一个前沿理论课题。在语言学领域,笔者还提出了复数的“全球汉语”之概念,以应对全球化对全球英语形成的影响,并相信在全球化的时代,世界语言体系将得到重建。在哲学领域,一些渴望探索普世问题并试图建立新的研究范式的哲学家也效仿文学研究者,提出了“世界哲学”的主张,并认为中国哲学应在这一领域建立中发挥奠基性的作用。在一直被认为是最传统的历史学领域,学者们在分析世界体系和编纂全球通史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而艺术就更是可以为全世界不同国家的人民所欣赏。因此,笔者认为,我们今天提出“全球人文”的概念是非常及时的,而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等人文学科的学者也确实就这个话题有发言权,并可以在这个层面上与国际同行进行有效的对话。

其次,既然“全球人文”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人们不禁要问,它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它是世界各国文学、历史和哲学等学科的简单相加吗?笔者认为事情没那么简单。就像世界文学不是各种民族文学的简单总和一样,它必须有一个评价和选择的标准。全球人文学科也是如此。它主要探讨全球文化、全球现代性、跨国主义、世界主义、全球生态文明、世界图景、世界语言体系、世界哲学、世界宗教、世界艺术等具有普遍意义的主题。尽管全球化总是可以在“全球本土化”的背景下实现,但对全球化人文的探索必须着眼于全球视角,以超越狭隘的民族主义视角。

最后,全球人文概念的提出并非意味着各民族的人文学术朝着一个模式去发展,而更是一种“全球本土化”的发展模式和方向。具体说来,中国的人文学术既产生自中国的本土,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同时又具有普适的意义和价值,因而其著述也可以为其他国家的人文学者所阅读和研究,并参与国际性的评价。^[11]

综上所述,我们今天在中国的语境下纪念罗伯逊这位全球化研究和理论探索的先驱,就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

注释:

[1] 参见[美]罗兰·罗伯森(逊):《全球化:社会理论和全球文化》,梁光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 Cf. Roland Robertson and Jan Aart Scholte eds., *Encyclopedi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6.

[3] 参见王宁主编:《全球化百科全书》,南京:译林出版社,2011年。

[4] 笔者在北京语言大学工作期间,曾与澳大利亚墨累大学、美国杜克大学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等单位联合发起,于1998年8月18日至20日主办了“全球化与人文科学的未来”国际研讨会,来自亚洲、欧洲和北美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60余人出席了研讨会。笔者和美国学者德里克、欧洲学者佛克马等中外学者分别作了主旨发言。

[5] Cf. Ning Wa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Roland Robertson and Kathleen White, eds., *Globalization: The Critical Concepts in Sociology* (six volumes), Vol. 6,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29 – 38; Ning Wang,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6, pp. 145 – 157.

[6] 关于笔者在国际学界发表的论述全球化与文化方面的英文著述和论文, 参见 *Globalization and Cultural Translation*,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2004; *Translated Modernities: Literary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 on Globalization and China*, Ottawa: Legas Publishing, 2010; "Postmodernity, Post-coloniality and Globalisation: A Chinese Perspective", *Social Semiotics*, Vol. 10, Iss. 2, 2000, pp. 221 – 233; "Chinese Studies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Literature and Culture", *Journal of the Institute of Asian Studies*, Vol. XVII, No. 2 (March 2000), pp. 55 – 64; "Confronting Globalization: Cultural Studies versus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Neohelicon*, Vol. XXVIII, No. 1, 2001, pp. 55 – 66; "Globalizing Chinese Literature: toward a Rewriting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Literary Cultur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3, Iss. 38, (2004, February), pp. 53 – 68; "Identity Seeking and Constructing Chinese Critical Discourse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Canadian Review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 30, No. 3 – 4, 2003, pp. 526 – 541; "Comparative Literature and Globalism: A Chinese Cultural and Literary Strategy",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41, No. 4, 2004, pp. 584 – 602; "'Death of a Discipline'? Toward a Global/Local Orient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in China", *Neohelicon*, Vol. XXXIII, No. 2, 2006, pp. 149 – 163; "Global English(es) and Global Chinese(s): Toward Rewriting a New Literary History in Chines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9, Iss. 63, 2010, pp. 159 – 174; "Highlighting the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Age of Globalization: Humanistics Education in China", *European Review*, Vol. 23, Iss. 2, 2015, pp. 273 – 285; "Introduction: Global Maoism and Cultural Revolutions in the Global Context",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Vol. 52, Iss. 1, 2015, pp. 1 – 11; "Globalization,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An Introduction and a Commentary", *European Review*, Vol. 24, Iss. 2, 2016, pp. 177 – 185.

[7] Roland Robertson, "Globalisation or Glocalisatio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1 (1994), pp. 38 – 39.

[8] Cf. Ning Wang, "Globalisation as Glocalisation in China: A New Perspective",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6, No. 11, 2015, pp. 2059 – 2074.

[9] 对西方理论家关于现代性的主要观点的讨论和批判性分析, 参见王宁:《文学现代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建构》,《南方文坛》2023年第4期。

[10] 参见王宁:《全球人文视野下的中外文论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17–30页。

[11] 这里仅列举两个具体事例:(1)由于笔者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坚持用英文著述,多年来一直名列爱思唯尔中国高被引学者之列;(2)在2023年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和爱思唯尔国际传媒集团联合发布的全球前2%顶尖科学家(文学研究)年度影响力榜单中,笔者和中国及华裔学者聂珍钊、杨玲、尚必武以及张隆溪均名列其中。当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几位入选者都发表了相当数量的英文著述,并得到英语文学研究界的关注和引证,而更多的仅活跃于中国语境中并仅用中文发表著述的中国学者则被排斥在这个榜单之外。

[责任编辑:李本红]